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36** 册

新中国与世界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orld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36册

新中国与世界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World

顾 宁 姚玉民 端木美 邸 文 于洪君 尹建平/著

顾问 章百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与世界/顾宁等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6
(世界历史)

ISBN 978-7-210-05455-9

I. ①新... II. ①顾...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7709 号

新中国与世界

顾宁 姚玉民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28 千 印数:1-4200 册

ISBN 978-7-210-05455-9 定价:42.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2—3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0791-86898827 电话:0791-8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历史》学术顾问

齐世荣 刘家和 庞卓恒 何芳川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主 任 武寅

副 主 任 于沛 吴恩远 周荣耀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必康 汤重南 李春放 张顺洪 张晓华

易建平 赵文洪 俞金尧 徐建新 郭 方

学术秘书 张晓华 (兼)

《世界历史》各卷负责人

《理论与方法》卷 / 于 沛

《经济发展》卷 / 吴必康

《政治制度》卷 / 徐建新

《民族与宗教》卷 / 郭 方 俞金尧

《战争与和平》卷 / 汤重南 易建平

《国际关系》卷 / 李春放

《思想文化》卷 / 赵文洪

《中国与世界》卷 / 吴恩远 张顺洪

《世界历史》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钟健华

副 主 任 周 文

委 员 朱法元 邓光东 周榕芳 林学勤

徐建国 彭新元 游道勤 朱卫东

书籍设计 揭同元

总 序

多卷本《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 卷、《剑桥中世纪史》8 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 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 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 G. 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W. H. 麦克尼尔等人

对“全球史观”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中的“世界史”重构潮流的发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然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已经逝去的“过去”进行包括价值判断在内的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我国,周谷城先生在 1949 年曾撰有 3 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 1962 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 4 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 6 卷本的《世界史》,并在 1994 年问世,以后又有齐世荣主编的 4 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及各类原始文献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要求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较大发展。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

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新的《世界通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它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广泛汲取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追踪当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对世界历史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时代的角度,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

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课题的研究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多卷本《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38册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世界史学者们集体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结论。这部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学者们在课题立项、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本著作还得到齐世荣、刘家 and 庞卓恒、何芳川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指导。此

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世界历史》编委会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2010年5月

前言：革命的中国与美苏冷战的碰撞 (1949—1978)^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渴望已久的国家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自成立时起，新中国就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始终不渝地奉行这一政策。“独立自主”与“和平”这两个词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外交方面最基本的诉求，它既是基于历史的经验，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然而，要贯彻这个总政策还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答案不是现成的，也不会一次给定。

外部两极世界，内部高度统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际形势、中国内政和中国外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外交格局的变动相当清晰地

^① 节选自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第四部分。该文收录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估算和外交指导思想的发展；同时，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和国内问题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

笔者把新中国成立后的前 30 年作为外交发展的一个大时期，并依这一时期外交格局的三次转变来划分阶段。这个时期，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普遍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一阶段。这几年，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保卫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并为恢复国民经济和随后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条方针。这三条方针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框架，并基本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这“三条方针”的提出和“一边倒”格局的形成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首先，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实现民族独立，恢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重塑中华民族的尊严。新中国领导人认为，旧中国外交的特征是屈辱外交，新中国要建立起新型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这种旧传统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方针和一些具体政策就十分强烈地反映出中共领导人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屈辱历史的决心。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难以避免，至于这种矛盾和冲突的表现形式、尖锐程度和持续时间则取决于双方的政策。

其次，新中国成立前后，对中共领导人来说，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怎样的对外战略才有利于新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当时的国际大环境是，冷战把世界分裂成互相隔绝的两个部分，冷战体制能

够迅速席卷全球,不仅因为美国和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而且因为它发端于对世界的发展居于支配地位的发达地区。工业国首先被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阵营,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转化为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经济体制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全面对抗。随后,冷战又逐步扩展到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新中国面临的现实是,它在亚洲冷战中首当其冲,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受到极大限制。美国仍在顽固地支持国民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而承认新中国;苏联已承诺支持新中国,但对中共仍抱有一定的疑虑,需要加以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主动站在苏联一边是最有利的、也最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做出这一选择也是依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包括辛亥革命后孙中山革命政府失败的教训,中共以往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教训,中共独特的按统一战线划分敌、我、友的原则来制定对外政策的方法,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一种革命理想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再次,选择“一边倒”不仅有外交方面的需要,也有内政方面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人们通常对“一边倒”的理解过于狭窄了,认为“一边倒”的意思就是“倒向苏联”。其实,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在毛泽东看来,“一边倒”是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而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将走什么道路。在阐述这一方针时,毛泽东首先强调的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允许走国内某些人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新中国成立在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大的原则问题作出明确回答。从这个角度来看,“一边倒”的方针既有对内涵义,也有对外含义。作为对外方针,“一边倒”这个词更多的是对新中国的外交取向所作的一种强烈的、形象的表达,而不是要对新中国外交政策作出精确的概括。毛泽东认为,新中国在内政和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选择、在相互对峙

的美苏两大阵营之间所做的选择与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是相互区别的两个问题,尽管它们之间有所联系。

最后,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领导人在外交方面还面临着一些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其一是得到国际上对新国家的承认;其二是为恢复经济取得外国的必要援助;其三是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显然,在选择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之后,要尽快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

实行“一边倒”是新中国外交迈出的第一步。总的来看,这个决策是成功的。这个阶段,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意识形态恰好高度统一。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政府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都达到了。新中国不仅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还通过谈判,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帝国主义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如果没有“一边倒”的决策,很难设想这些问题能够比较顺利地得到解决。此后,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了国际舞台。

客观形成的“一边倒”格局,不仅是新中国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作出反应的结果。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一边倒”格局固定化和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随后中美两国军队在朝鲜的对抗,“一边倒”的局面有可能不会持续那样长的时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但美国并没有回应。

以回顾的眼光来看,“一边倒”就短期而言,无疑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就长期发展而论,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主要是

它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同时,在这一格局下,新中国对外经济联系的主要对象是苏联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深刻地体现出来。

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外交的另一条重要线索是沿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展开的。周恩来提炼的这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条结成一个有机体,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推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作用是突破美国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寻求对外关系的普遍发展,以弥补“一边倒”造成的不平衡。正是由于五项原则全面反映了中国外交的长期诉求,因而它要比“一边倒”更有生命力,影响也更深远。

“一边倒”的格局表面看来一直维持到60年代初期,但实际上从50年代后期就开始松动了。

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是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56年起,中国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国际事务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也尝试着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从这时起,中国逐渐走上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的道路。整个60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打倒帝、修、反”口号的提出,使这种外交格局看起来似乎更加不可动摇。

在这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首先,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主导世界格局的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变化,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即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转为紧张与缓和轮流交替。其次,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从这时起,两大阵营都遇到了

如何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在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美国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作为这一矛盾的内在动因,是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最后,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这三种趋势的出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僵硬的冷战格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改变这一格局的主、客观条件当时都还不成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还不明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从 50 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一些迹象表明,中苏分裂似乎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说明,尽管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由于中苏两国各自的内部发展处在不同阶段,两国在国际体系中又处于不同地位,两国的实际利益并不一致,两国领导人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因此不同,而由此产生的矛盾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内还很难协调。当苏联出于自身内政外交的需要力图谋求与美国的缓和时,中苏之间的矛盾就彻底爆发了。现在看得很清楚,这个时期,美苏之间并不具备真正实现缓和的条件;但美苏时断时续的缓和活动却总是使中国首当其冲。以至于在某些时期,一个由于美苏对峙而形成的冷战世界看上去像是由于中美对峙而造成的。这一分裂使得中苏两国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不过,它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由于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羁绊,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一支更加独立的力量。

从 50 年代后期至 60 年代前期,中国敏感地抵制了苏联把中国外交纳入其全球战略轨道的一切可能,坚决反对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有力地支持了印度支那各国的抗美斗争,并通过中印边界反击战保卫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与此同时,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有所扩大。中国与一批亚非拉国家及西欧的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解决了同某些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签订了一系列边界条约并宣布取消双重国籍,通过大使级会谈与美国建立了接触渠道。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时期,中苏关系全面倒退、中印关系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文化大革命”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其实是原先那种“左”倾思想的延续和恶性发展。它在外交方面主要有三点表现:第一,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和谐的关系,愚昧地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了错误判断,片面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甚至设想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所谓战略。最后,在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乃至局部失控的情况,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在一个想象中的以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起点的世界革命设计中,中国人似乎重温了那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旧梦。

在这十几年里,中国外交渐呈曲折发展之势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面对多变然而并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

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包括: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对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对中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也估计偏高。事实上,60年代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反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高速增长。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当时在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之外。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方面还是由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潮造成的。这种“左”倾思潮部分地来自教条,部分地来自对以往经验的迷惑。

回过头来看历史就不难发现,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的外交实践是中国对其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所进行的探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探索不可避免地会带着上个时代留下的某些思想烙印。革命具有巨大的惯性。在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时代结束之后,为那个时代所造就的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依然习惯于以那个时代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习惯于用那个时代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了“国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随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快影响到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判断。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中苏分裂后,一方面,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按社会制度画线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有少数领导人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存在着问题,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严厉批评。这个阶段所经历的曲折不仅生动地反映出对执政党来说客观准确地把握国际大势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也反映出当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党和国家的工作应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时,外交工作会受到怎样的困扰。